

瑞典的技職教育

胡茹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教授

摘要

在全球產業轉型、數位化與綠色經濟快速推進背景下，技術及職業教育已成為連結教育、就業及終身學習之重要機制。瑞典作為北歐福利國家，其技職教育制度兼具公共性、分權治理、產業參與及學習路徑彈性，被視為兼顧教育公平及勞動市場需求之重要手段。本文採文獻分析法，依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歐洲職業培訓發展中心、歐盟執委會、瑞典高等職業教育署、瑞典國家教育署及臺灣官方法規與政策文件，探討瑞典技職教育之制度定位、課程結構、工作本位學習、高等技職教育與成人技職教育之發展，並分析其當前面臨之主要挑戰及近年改革方向。本文發現，瑞典後期中等教育階段之技職教育課程，具有明確國家課程架構及目標，透過地方政府、辦學者、企業與社會夥伴共同運作，形成制度化的學校本位與學徒式並行模式。然而，該制度仍面臨技職教育吸引力相對不足、課程供給與區域技能需求未必完全對接、技職教育合格師資短缺，及弱勢學生銜接支持不足等問題。近年瑞典透過強化區域技能治理、擴充高等技職教育名額、擴大工作本位學習、推動成人國家職業教育試辦，及發展弱勢者之基礎職業課程等措施，進行精進。本文進一步將瑞典經驗與臺灣『技術及職業教育法』、及最新『技術及職業教育政策綱領』進行對照，指出臺灣可從升學與就業並行路徑、區域技能供需治理、產學協作制度化及終身學習銜接等面向汲取借鏡。

關鍵詞：瑞典；技術及職業教育；工作本位學習；學徒制；終身學習

壹、前言

在全球供應鏈重組、智慧製造、淨零轉型及數位技術快速發展驅動下，技術及職業教育（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TVE 技職教育）已逐漸由傳統之中等教育分流機制之一環，轉變為支撐國家技能形成、青年就業銜接與成人再培訓的重要制度平台。相較於僅以學術升學為主軸的教育模式，技職教育更直接面向產業技能、工作場域學習及職涯轉換，因此在當代公共政策中，技職教育已不只是教育議題，更涉及勞動市場治理、區域產業發展及社會融合諸面向。在歐洲國家中，瑞典技職教育制度，並非建立在嚴格階層化的早期淘汰邏輯之上，而是在公共教育普及、福利國家保障與地方自治傳統的基礎上，逐步形成兼具教育公平與職業準備功能的制度架構（Cedefop, 2023; OECD, 2025）。

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最新的研究，瑞典高中階段共有 18 項國家課程，其中 12 項為職業課程，6 項為高等教育預備課程，顯示技職教育在其中等教育體系中具有明確功能且已制度化；此外，瑞典的中等技職教育為完全公費且對學生免費，並由地方政府、獨立辦學者及特定產業學校共同提供；在制度運作上，中央透過法律、課綱與文憑目標維持一致性，地方則依據區域情境與辦學資源實際執行，形成兼具統整與彈性的治理模式（OECD, 2025）。從近年改革趨勢觀之，瑞典亦持續透過高等技職教育擴充、成人職業教育試辦、工作本位學習強化與技能供需治理調整，回應勞動市場對新興技能的需求（European Commission, 2025; Myndigheten för yrkeshögskolan, 2026）。

然而，制度成熟並不意味不存在問題。近年研究與官方報告顯示，瑞典技職教育仍面臨若干結構性挑戰，包括技職路徑的社會吸引力相對有限、教育供給與區域產業需求之間存在落差、合格技職教師不足，以及部分未達入學門檻學生在銜接與支持上仍面臨壓力（European Commission, 2025; Kristmansson & Fjellström, 2022）。因此，若要理解瑞典技職教育的價值，不能只停留在制度表面的「北歐典範」想像，而須進一步剖析其制度形成邏輯、運作特徵、現存問題與改革路徑。基此，本文自政策學習及技能形成觀

點，整理瑞典技職教育制度之主要內涵，包括瑞典政府、企業及學校於技職教育人才培育之分工及教學與訓練型態，進一步與臺灣現行技職教育法制與政策綱領相互對照，提出可供臺灣技職教育政策與制度發展參考之觀察。

貳、瑞典技職教育之制度定位

瑞典教育制度以公共性、普及性及制度整合性為其核心特徵。學生通常在完成九年義務教育後，約於 16 歲進入後期中等教育 (*gymnasieskola*)。該教育階段雖非法定義務教育，但其實際參與率極高，因此已成為瑞典青年接受後期中等教育之普遍路徑；在後期中等教育階段，瑞典設有 18 項國家課程，其中 12 項屬於職業課程，6 項屬於高等教育預備課程，所有國家課程原則上均為三年制 (OECD, 2025)。此一制度安排，說明瑞典在高中階段雖存在學術與職業分流，但此種分流並非封閉式或不可逆，而是保留相當程度之銜接與轉換可能性。換言之，瑞典技職教育之制度定位，並非單純作為「較低成就學生」之替代性選項，而是作為後期中等教育內部一條具備職業準備、繼續進修與終身學習延展性之正式學習路徑。

瑞典技職教育之治理模式同樣具有制度上的特殊性。依據 OECD (2025) 最新的報告顯示，瑞典技職教育雖由國家訂定課綱、文憑目標及架構，但在實務運作上，則由市政府、獨立學校及專門產業學校負責執行；此外，國家與地方層級，均設有課程或方案委員會，並納入雇主及工會參與，顯示其治理並非單向的官僚控制，而是具有社會夥伴參與之協商色彩。瑞典國家教育署 (Swedish National Agency for Education, Skolverket) 亦明確指出，其任務包括支持後期中等技職教育品質提升，並負責職業課程的國家委員會運作，反映技職教育在瑞典教育行政架構中具有相對獨立且重要的政策地位 (Skolverket, n.d.)。

值得注意的是，瑞典的後期中等技職教育並非對所有學生完全無門檻開放。依歐洲職業培訓發展中心 (*Centre européen pour le développement de la formation professionnelle, Cedefop*) 資料顯示，學生若欲進入國家課程，須在瑞典語、英語、數學及若干其他科目達到基本成績要求；未達資格者，

通常需先進入導引課程（introductory programmes），再逐步銜接國家課程、成人教育或就業路徑（Cedefop, 2023）。因此，瑞典技職教育雖具高度普及性，但其實際運作仍與基礎教育成就、補救支持與學生轉銜機制密切相關。從比較教育角度來看，這也意味瑞典技職教育的制度定位，並非僅靠課程分類所決定，而是奠基於一套包含於普通教育、補救教育、職涯輔導與成人教育等政策網絡中。

參、瑞典技職教育之結構、辦理型態及核心特色

瑞典技職教育的核心主體是後期中等教育階段的 12 項職業課程。依據 OECD（2025）研究的彙整，此 12 項課程包括兒童與休閒、建築與土木、電力與能源、車輛與運輸、工藝、銷售與服務、旅宿與觀光、工業技術、自然資源、餐飲食品、暖氣通風空調與不動產維護，及健康與社會照護領域。上述 12 項課程領域之範圍，不僅涵蓋傳統工業與工程技術，也延伸至照護、服務、觀光與生活產業，顯示瑞典技職教育的職業領域配置，已隨產業結構變遷持續調整。同時，每一項職業課程均建立在國家課綱、科目綱要與文憑目標之上，使其在全國範圍內具備一致性與可比性。此制度設計，有助於降低因地方分權所可能帶來之課程品質差異，也使職業課程文憑具有較明確的國家公信力。

在教學與訓練型態方面，瑞典技職教育最重要的特徵之一，是工作本位學習（work-based learning, WBL）已被納入法制化的課程要求。依據 OECD（2025），在一般學校本位職業課程中，至少 15 週的學習時間必須在工作場域進行；若採學徒式教育路徑，則至少有一半訓練須於工作場所完成。這代表瑞典雖非典型德語系二元制國家，但其技職教育早已超越「校內理論、校外短期實習」的附屬式安排，而是將產業之工作場域視為課程正式且必要的一部分。歐盟（European Commission, 2025）亦指出，瑞典學徒制度近年持續擴張，2024 年已有 64.6% 的技職畢業生曾接觸工作本位學習，已高於歐盟 2025 年設定的 60% 目標。此一發展不僅反映政策鼓勵，也說明瑞典正透過工作本位學習來提升技職教育與勞動市場之連結強度。

瑞典技職教育的第二項核心特色，是學習路徑的可續進性。傳統上，許多國家的技職分流容易造成升學受阻，使職業教育被視為終端性、低地位或低期待的教育選項。相對而言，瑞典雖曾在制度上出現技職課程與高等教育資格之間的爭議，但整體制度設計邏輯，仍強調職業教育不應成為封閉路徑，而應與後中等技職教育、高等教育與成人教育相互銜接。在後期中等技職教育外，瑞典另設有高等職業教育(*Yrkeshögskola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HVE*)，其核心理念是根據真實勞動市場需求，規劃課程，並與雇主及產業密切合作辦理。依瑞典高等職業教育署資料顯示，高等職業教育由大學、地方政府或私立培訓機構等教育提供者承辦，但其設置前提是對應明確的勞動市場需求，並在課程中與雇主、產業密切合作(*Myndigheten för yrkeshögskolan, 2026*)。亦即瑞典技職教育不再侷限於青年初次就業準備，而是成為連結後期中等教育專業培育及與中、高階技能養成之重要基石。

第三，瑞典技職教育並非只重視操作技能，亦重視職業知識、判斷力與整合能力。Christidis 與 Lindberg (2019) 以瑞典健康與社會照護課程為例指出，職業教育中的跨科整合教學，有助於學生形成更完整的「職業知識」，其內涵不僅是技術操作，亦包含倫理判斷、情境理解與反思能力。這種觀點顯示，瑞典技職教育的理想不只是培養能立即投入勞動市場的操作型人力，而是希望在一般素養、專業能力與情境判斷之間，建立較完整的能力養成。若從當代技能形成的觀點來看，這種培育取向更能回應高度不確定與跨域協作的工作世界。

肆、瑞典技職教育面臨之問題與改革

儘管瑞典技職教育制度在結構、法制與政策理念上均相當成熟，但其實務運作仍呈現若干值得關注的挑戰。首先，是技職教育吸引力相對不足的問題。依 OECD (2025) 比較分析，瑞典後期中等教育學生中，選擇職業課程者，約占 1/3，顯示在普及高中教育的制度環境下，學術導向課程仍是較多數學生的選擇。這一現象一方面反映學生與家庭對高等教育的長期偏好，另一方面也意味職業教育雖具制度正當性，卻未必在社會認知中享有同等

地位。對於需仰賴穩定技術人才供給的產業而言，若技職教育無法持續吸引學生，則中長期的人才供應，將受到影響。

第二，教育供給與勞動市場需求間，並非總能自然對接。歐盟（European Commission, 2025）指出，瑞典已自 2024 年起實施後期中等技職教育的重要修法，要求辦學者在規劃與組織職業教育時，必須同時考量學習者及勞動市場之需求，並由區域層級設定供需優先事項與能力目標。自上述修法規範內容顯示，先前所設之課程與招生供給，仍可能更受地方辦學條件、學校偏好或學生選擇所影響，而不必然與區域產業結構完全吻合。亦即，在高度分權治理下，如何兼顧教育自主與技能配置，始終是瑞典技職教育治理的核心課題。

第三，技職師資短缺與資格不足問題，對制度品質形成實質壓力。Kristmansson 與 Fjellström（2022）指出，瑞典後期中等技職教育教師必須具備高度相關的職業實務經驗，但其中仍有 44% 未具教師證書，亦即並非正式合格教師。該研究並引述官方推估指出，若依現行供需趨勢發展，至 2033 年瑞典可能面臨約 12,500 名具正式教學訓練之技職教師缺口。這顯示瑞典技職師資制度面臨明顯兩難：若過度強調產業實務背景，正式教師培育量能可能不足；若僅強調教育資格，又可能削弱教師的職場實務經驗。對技職教育而言，這不僅是人力數量問題，更涉及課程整合、學生指導與職場學習品質的穩定性。

第四，弱勢學生的銜接支持仍有不足。Cedefop（2023）指出，未達國家課程入學資格的學生需先進入導引課程，再逐步銜接職業課程、成人教育或就業。從制度理念而言，導引課程提供了補救與轉銜的彈性；然而，若相關支持措施不足，則此類學生仍可能在教育歷程中延宕或被邊緣化。歐盟報告亦指出，2022 年瑞典約有 15% 的學生未能達到進入後期中等教育的成績要求，顯示即使在教育福利制度成熟的國家，學習弱勢與轉銜不利仍是不可忽視的議題（European Commission, 2025）。

針對上述挑戰，瑞典近年改革方向相當明確。其一，是透過更強的區域技能治理，提升供需對接。根據 Cedefop（2025），瑞典國家優先事項之一，是改善依據區域技能需求所進行的教育規劃，亦即將技職教育由較傳統的

教育供給邏輯，逐步導向更具前瞻性的技能供需治理。其二，是持續擴大高等技職教育與成人職業教育。歐盟資料顯示，2024 年瑞典高等職業教育核定名額達 40,000 名，較前一年增加 16%，且約 1/3 課程採遠距或彈性形式辦理，此種辦理方式，有助於擴大終身學習及跨地域學習機會（European Commission, 2025）。其三，是試辦新的國家成人職業教育。同一份報告指出，瑞典自 2024 年至 2028 年試辦新的後期中等教育層級之成人國家職業教育，其課程結合工作本位學習與產業合作，並優先培育建築、電力、運輸、機械與農業等缺工領域人才（European Commission, 2025）。其四，是針對語言弱勢者與新移民發展基礎職業課程，以降低語言門檻對職業教育參與的排除效果（European Commission, 2025）。

整體而言，瑞典近期改革並非僅修補個別制度缺口，而是在更宏觀的層次上，將技職教育重新定位為支撐綠色轉型、區域發展與終身學習的重要技能生態系統。

伍、瑞典與臺灣技職教育之簡要比較與政策啟示

若將瑞典技職教育經驗與臺灣制度相互對照，可以發現兩者在制度理念上既有相似之處，也呈現明顯差異。在法制層面，臺灣『技術及職業教育法』（2019）第 3 條已將技職教育區分為職業試探教育、職業準備教育及繼續教育，顯示臺灣法制上同樣承認技職教育應涵蓋探索、準備與持續進修等不同階段。同法第 9 條，明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開設或融入職業試探與生涯輔導課程；第 10 條並規定國民中學得與技職校院或職業訓練機構合作辦理技藝教育，反映臺灣已在國中階段即建立職業探索與早期分流前之準備之法制基礎。此點與瑞典強調生涯導引、轉銜支持及後續彈性路徑的制度邏輯，具有一定相通性。

若進一步比較制度運作層次，瑞典與臺灣仍存在若干關鍵差異。首先，在教育與勞動市場之連結形式上，瑞典的工作本位學習已是法定課程結構的一部分，後期中等職業教育至少需配置一定比例之職場學習，學徒式路徑更要求半數以上訓練在企業場域完成（OECD, 2025）。相較之下，臺灣雖

已透過產學攜手、校外實習、產業學院、建教合作及業界專家協同教學等多元機制強化產學合作，但工作本位學習的制度化程度、跨區域一致性與品質監督機制，仍有持續深化空間。『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 11 條與第 12 條已明定專業課程得由學校與產業共同設計，並得開設實習課程，顯示法制基礎已具備。然而在實務運作上，產業對於與學校共同合作，或是對於實習生之培訓觀念及態度，仍須予以檢視，亦即產業係將實習學生視為未來公司員工之培育？抑或僅為替代人力？換言之，臺灣若要進一步強化學用對接，仍需在課程結構、產業參與密度與實習品質保證上，更加制度化。

其次，在升學與就業並行路徑方面，瑞典較強調技職教育並非終端路徑，而是可通往高等技職教育與成人教育的持續學習體系。臺灣雖已形成完整之技專校院體系，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亦可銜接二專、四技及科技大學，制度上並不缺乏續進可能；然而，社會認知與實務上，仍常將技職教育的價值，理解為「升學競爭中的另一條道路」，而非獨立且具有專業榮譽的技能形成體系。瑞典經驗提醒我們，真正提升技職教育地位，不僅是讓學生「可以升學」，更重要的是建立技職教育本身的學習品質、職業認同與就業價值，使升學與就業不是彼此替代，而是可並行、可轉換的發展路徑。

第三，在治理層面，臺灣目前已逐步朝向產官學協作與政策綱領治理方向前進。行政院公告之『技術及職業教育政策綱領』第 5 版明確提出 3 大目標：「前瞻擘劃技職教育人才培育」、「擴大社會資源投入技職教育」及「加速創建技職教育生態系」，而為達成三大目標，再以「創新技職教育入學及學習模式」、「激勵技職教育參與者創新思維」、「擴展產官學共同培育技職教育人才」、「結合社會資源推展技職教育」、「打造技職教育智慧化學習環境」及「建置技職教育跨域整合學習網絡」六大發展重點，作為引導中央政府及直轄市、縣（市）政府，進行技職教育政策之規劃與推動（行政院，2025）。上開目標及發展重點，與瑞典近年強調區域技能供需治理、社會夥伴參與及終身學習延展性之政策趨勢相近。尤其是瑞典將區域層級納入技能需求規劃，使教育供給與產業發展更緊密連動之作法，對臺灣技職教育政策之推動，具有重要借鏡意義。蓋因，於實務運作層面中，除教育部、直轄市因有其主管之專科以上學校、高級中等學校，故於政策規劃上，較重視

學校與產業間之連結，及各該連結對區域產業人才培育供需之問題。至於縣（市）政府，則多以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為其主管學校，故就區域產業技能需求，則教育主管機關之參與程度，不及經建主管機關，亦非縣（市）政府教育政策所關心之事項。

第四，在成人技職教育與再培訓方面，瑞典近年的制度調整尤具啟發性。瑞典不僅持續擴張高等職業教育，也透過新的成人國家職業教育試辦，以及面向語言弱勢者的入門職業課程，將技職教育視為支撐勞動轉型與社會整合的重要政策工具（European Commission, 2025）。相較之下，臺灣雖已有進修部、推廣教育、產業人才投資方案、在職專班與成人回流教育等措施，但制度整體性與跨部會協調仍可再強化。臺灣於因應數位轉型、淨零排放轉型與高齡社會挑戰下，技職教育不宜侷限於青少年職業準備教育，而應更積極納入終身學習與技能再訓練之核心架構中。

綜合而言，瑞典經驗對臺灣至少有 4 點政策啟示。第一，職業探索、職業準備及職業繼續教育，應被視為連續性制度，而非彼此切割的教育階段。第二，工作本位學習應從「實習活動」進一步提升為具有學習目標、品質保證與企業責任的制度化課程安排。第三，技職教育治理需更積極導入區域技能需求與產業轉型資料，使招生、設科與資源配置具備更強的連結性。第四，技職教育的社會價值提升，不能只依賴升學通道擴充，還必須同時建立專業榮譽、產業認同與穩定的職涯發展路徑。這些觀察，正與臺灣現行法制與政策綱領強調的產業對接、職涯多元發展、師資強化與生態系建構方向相互呼應，但仍有待在制度執行面持續深化。

陸、結論

本文從制度發展、辦理型態、問題挑戰與改革方向等面向，整理瑞典技職教育之主要特色，並與臺灣技職教育進行簡要比較，如下表。

表：瑞典與臺灣技職教育之比較

面向	瑞典	臺灣
制度定位	非僅靠課程分類所決定，而是奠基於一套包含於普通教育、補救教育、職涯輔導與成人教育等政策網絡中。	區分職業試探、職業準備及職業繼續教育，制度層級完整。
治理模式	中央訂課綱與文憑目標，地方與獨立辦學者執行，並有雇主與工會參與。	中央法制與政策方向明確，近年強調產官學協作與技職教育生態系建構。
工作本位學習	學校本位課程至少含 15 週工作場域學習；學徒式課程至少半數訓練在職場完成。	已具校外實習、建教合作與產學攜手等制度，但跨校品質保證與制度化程度仍可強化。
續進與終身學習	高等職業教育與成人職業教育近年擴張，支撐轉職與再培訓。	技專校院體系完整，但成人回流、技能再培訓制度，仍有深化空間。
主要挑戰	吸引力不足、師資短缺、區域技能供需落差、弱勢學生銜接壓力。	社會刻板印象、學用落差、少子女化影響生源及技職師資缺乏與實務增能需求。

整體而言，瑞典技職教育的核心價值，不在於其是否建立了絕對理想化的雙軌體系，而在於透過公共投資、國家課綱、地方治理及社會夥伴參與，逐步形塑出兼顧教育公平、勞動市場需求與終身學習延展性的制度架構。其後期中等教育的 12 項職業課程、工作本位學習法制化、高等職業教育擴充與成人職業教育試辦，均顯示瑞典已將技職教育視為國家技能形成與社會整合的重要支柱，而非單純的次級教育選項。

然而，瑞典案例也提醒我們，即使是在高度福利化與教育公共性較強的國家，技職教育仍會面臨社會吸引力不足、師資短缺、區域供需失衡與弱勢

學生轉銜支持不足等現實問題。因此，技職教育改革不應僅聚焦於個別課程調整或招生措施，而應從更整體的技能生態系角度思考，使教育、產業、區域治理與終身學習，形成制度上的連動。瑞典近年改革之所以值得重視，正因其不僅修補制度缺口，更在重新界定技職教育於綠色轉型、產業升級與社會融合中的戰略角色。

對臺灣而言，瑞典經驗的最大啟示，在於技職教育不能只被理解為中等教育階段的分流安排，而必須被視為從職業試探、職業準備到職業繼續教育的完整體系。當前臺灣在『技術及職業教育法』及《技術及職業教育政策綱領》下，已具備相當明確的制度基礎與政策方向；未來若能在區域技能供需治理、工作本位學習制度化、師資實務增能及成人技職教育整合方面持續深化，則更有機會建構出兼顧務實致用、創新轉型與社會流動的技職教育體系。換言之，瑞典案例對臺灣的價值，不在於照單全收其制度形式，而在於理解其背後的治理邏輯：讓技職教育成為連結學校、產業與人生不同階段學習需求之重要媒介。

參考文獻

- 『技術及職業教育法』（201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40028>）（2026/3/10）
行政院。2025。『技術及職業教育政策綱領』
（<https://ws.moe.edu.tw/001/Upload/3/refile/6315/88951/6cb26d36-5f2d-408f-8989-7664717ff95f.pdf>）（2026/3/10）
- Cedefop. 2023.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Sweden: Short Description.”
（https://www.cedefop.europa.eu/files/4212_en.pdf）（2026/3/1）
- Cedefop. 2025.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olicy Briefs 2024: Sweden.”
（https://www.cedefop.europa.eu/files/vet_policy_briefs_2024_sweden_cedefop_2025_0.pdf）（2026/3/10）
- Christidis, Maria, and Viveca Lindberg. 2019. “Subject-Integrated Teaching for Expanded Vocational Knowing and Everyday Situations in a Swedish Upper Secondary Health and Social Care Program.” *Vocations and Learning*, Vol. 12, pp. 479-98.
- European Commission. 2025. “Education and Training Monitor 2025: Sweden.”
（<https://op.europa.eu/en/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0202abf4-beb6-11f0-a612-01aa75ed71a1/language-en>）（2026/3/10）
- Kristmansson, Per, and Magnus Fjellström. 2022. “Motivations to Have a Second Career as a Teacher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Vocations and Learning*, Vol. 15, No. 2, pp. 407-25.
- Myndigheten för yrkeshögskolan (Swedish National Agency for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2026.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Yrkeshögskolan).”
（<https://www.myh.se/in-english/higher-vocational-education-yrkeshogskolan>）
（2026/2/25）
- OECD. 2025.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ystems in Nine Countries.”
（https://www.oecd.org/content/dam/oecd/en/publications/reports/2025/10/vocational-education-and-training-systems-in-nine-countries_6169d7a2/1a86eb6c-en.pdf）
（2026/3/5）
- Skolverket. n.d. “This Is the Swedish National Agency for Education.”
（<https://www.skolverket.se/andra-sprak-other-languages/english-engelska>）
（2026/3/3）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Sweden

Ru-Ping Hu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digitalization, and the green transition,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TVE) has become a key policy field connecting education, employment and lifelong learning. Sweden, as a Nordic welfare state, has long been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case for balancing educational equity and labor market responsiveness through a publicly funded yet decentralized TVE system with strong social partner engagement. This article employs documentary analysis to examine the institutional positioning, curriculum structure, work-based learning arrangement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adult vocational pathways in Sweden. The analysis draws on recent materials from the OECD, Cedefop,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Swedish National Agency for Education, and laws and policy documents in Taiwan. The findings show that Swedish upper-secondary TVE is characterized by nationally defined curricula and diploma goals, implemented through municipalities, independent providers, employers, and program councils, thus forming a dual structure that combines school-based provision with apprenticeship routes. At the same time, the system faces challenges including limited social attractiveness, imperfect alignment between program supply and regional skill demand, shortages of qualified vocational teachers, and insufficient support for disadvantaged learners in transition. In response, Sweden has strengthened regional skills governance, expanded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reinforced work-based learning, piloted a new nat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 route for adults, and developed entry-level vocational courses for learners with weak Swedish-language proficiency. By comparing the Swedish experience with Taiwan's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ct and latest *TVE Policy Guideline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aiwan can draw useful lessons in building parallel employment and progressing pathways, regional skills planning, institutionalized industry-school collaboration, and coherent lifelong learning articulation.

Keywords: Sweden;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work-based learning; apprenticeship; lifelong learning